

LU XUN PING ZHUAN

曹聚仁 著



鲁迅

评传

东方出版中心



鲁迅

评传

曹聚仁 著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 1996 年 1 月 1 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鲁迅评传

曹聚仁 著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 335 号 邮编 200336)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2.2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 266 千字 插页 3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 1999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总厂

印数: 1—3000

ISBN 7-80627-415-4/I·141

定价: 18.00 元

142146



鲁迅先生的最后一次留影
(摄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八日)

出版说明

关于鲁迅先生的传记和评传,国内不下十数种版本,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可以说是最具个性的一本。传主和作者,是同时代人,且是当时文坛交往甚密的文友。因此,曹著《鲁迅评传》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者对鲁迅先生的思想、文艺观、社会观、政治观乃至个人脾性等方面的了解、认识、评介,具有直接鲜活的印象及一般作者无法企及的深入了解,他既“不需要仰视也不必俯瞰”,诚如作者 1933 年秋亲口对鲁迅说:“与其把你写成为一个‘神’,不如把你写成为一个‘人’的好。”此书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在当时特定的时空里,作者的思想,也少“羁绊”,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可以自由地写鲁迅评传,包括自己的传记”。这些独特的主客观因素,无疑为我们研究鲁迅提供了一份值得重视的范本。此书问世至今已 40 余年,而大陆读悉这本评传的读者,怕也为数寥寥。今征得作者长女曹雷同意,授权东方出版中心,首次在大陆出版。这就是我们重新出版《鲁迅评传》的缘由。

作者宣称:

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文坛的彗星,他的眼光远大,头脑清晰,那是我们不可企及的,但他决不是圣人。要把他想象为“十全十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那是错误的。

fyg/hz

所以,在整理这部旧作时,我们充分注意到这一点。除个别论述,征得曹雷女士意见,作了必要的处理,其余全部只字未动。但为了有利于读者客观地研读,我们特地请了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漱渝教授写了序:《毋求备于一夫》。历史上的误解,可以澄清;学术上的歧见,可以由专家学者探讨求得共识。

《鲁迅评传》五十年代在香港初版发行后,不久即被盗版,且被删去若干章节,搞得面目全非。此次重版,编辑者和曹雷翻寻了几个版本,重新补齐,恢复了原貌。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曹聚仁先生在香港写书,书中引鲁迅著作、书信的文字,均没有出处,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原文,了解引文真切意蕴,此次重版,一一查明出处,加了脚注,共 295 处之多。这是一件十分费力的事。这件工作,蒙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陈鸣树教授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常务副馆长副研究员王锡荣先生帮忙指点,在此一并感谢。兹此说明。

编 者

1998 年 5 月

“毋求备于一夫” ——读曹著《鲁迅评传》

陈漱渝

据说《尚书》中有一句话，叫做“毋求备于一夫”。其含义是：各人有各人的见识，各人有各人的特长，不能万物皆知，万事皆懂，所以不能对任何人求全责备。曹聚仁先生自幼受这句话影响很深。在撰写《鲁迅评传》时，他就用上述观点来看待和分析鲁迅及其作品。

其实，鲁迅在评人论世的时候，也从来都反对求全责备。他明确指出：“但现在的人，的事，那里会有十分完全，并无缺陷的呢，为万全计，就只好毫不动弹，然而这毫不动弹，却也就是一个大错。”（《二心集·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在《思想·山水·人物》一书的《题记》中，鲁迅更明确地指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我想，用鲁迅的上述观点评价曹聚仁及其作品，显然也同样适用。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曹聚仁是一位以多方面业绩显示自己才华的人物。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曹聚仁又以“海外哨兵”的姿态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很多至今仍然鲜为人知的工作。他极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和极为丰富的论著，为我们留下了许多饶有兴味的佚事，也留下了许多值得深入思索和探讨的话题。

曹聚仁是谁？让我们逐层揭开他的神秘面纱——

他说他“最不爱写文章”，但给我们留下的著作却有七十余部，积四千余万言。

他很以国学自负。1922年章太炎先生在上海主讲国学，能听懂者寥寥无几，而时年22岁的他却将太炎先生的讲词记录增补，整理成《国学概论》一书，受到读者欢迎，先后印行达32版。富有戏剧性的是，时隔六十余年后，他一生研习国学的得意之作《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恰巧由太炎先生之孙章念驰先生校订推出。

他又常以史人自命，著有《中国史学ABC》、《中国近百年史话》、《蒋百里评传》等。他的《蒋经国论》对这位传主的复杂性格作了多方面揭示，对其历史功过也作了比较客观的褒贬。195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居仁堂会见他时曾向他索要此书。

不过，在他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教授生涯和记者生涯中度过的。他虽然只是一个五年制师范的毕业生，却做了二十多年大学教授。真正使他名声远播而且成为争议人物的是他的编辑采访活动。早在1931年，他就主编了以乌鸦为图腾的《涛声周刊》。他倡导的“乌鸦主义”，就是反对光报喜不报忧的纯理性的批判主义。由于该刊发表了不少跟当局唱反调的文章，只出了83期便获“袒护左翼，诽谤中央”的罪名而寿终正寝。全面抗战开始之后，他着一身旧军装，腰间束一条皮带，当上了战地记者。他在屯溪会见了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后来又在《中国抗战画史》中对八路军的战绩作了正面报道。举国为之欢腾士气为之大振的台儿庄大捷，也是由他抢到了头条新闻。从1956年至1965年，他又从香港六次回大陆采访，写成了《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人事新语》等著作，“宣传祖国的新气象”，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肯定。

他在总结七十余年的生涯时,认为自己长期在社会革命和国家统一这两者之间彷徨苦闷,后来终于为谋国家统一而努力。1956年秋,他致函胡适,动员这位实验主义大师回祖国大陆去作一较长时期的考察,以肯定中共所进行的“政治试验的正当”。他曾建议让蒋经国和陈毅在福州口外的川石岛上直接接触,洽商国共的第三次合作事宜。他还想亲赴台湾说服蒋经国“易帜”,说服蒋介石以江西庐山为“优游山林,终老怡养之地”。然而蒋介石表示,要他生前做李后主,这不可能。由于蒋经国身体不好,陈毅元帅又于1972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他牵线未成,就含憾以歿。

由于他的复杂经历,复杂思想,复杂性格,人们长期对他褒贬不一。自视甚高的柳亚子先生在1936年2月13日的一封信中,表示舆论界中所佩服之人除鲁迅之外,恐怕只有他。五十年代他由上海移居香港之后,因对大陆形势的介绍有赞有弹而被一些自命为左派的人士迎头痛击。与此同时,亲台湾的右翼人士也认为他“非我族类”。所以他在给女儿曹雷的信中说:“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父亲,只是一个不好不坏,可好可坏,有时好有时坏的人。”

总结曹聚仁的文化业绩,不能不论及他的鲁迅研究。他在这方面做了三件事:一,经夫人邓珂云协助整理,於1937年在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了史料汇编《鲁迅手册》。二,1956年在香港世界出版社出版了《鲁迅评传》,约26万字。三,1967年在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了《鲁迅年谱》,包括收录的资料,约20万字。这三部著作,在鲁迅研究史上都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后两部著作,在海外的影响更为广泛。因此,作为一种重要的学术史料,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决定重印曹著《鲁迅评传》是很有学术眼光的。

曹聚仁认为他研究鲁迅有以下三个优势：一，他虽然从不说“鲁迅是我的朋友”，但跟鲁迅也并非泛泛之交。而他所知的《鲁迅传》的作者都是没有见过鲁迅，不了解鲁迅的人。二，他有这方面的资料积累。三，他有史学研究的功底，既能鉴别史料，又能组织史料，可以写出比较合理近情的传记。不过，曹聚仁也承认他无法成为一面镜子，并没有十足把握反映出鲁迅真实的形象来；他自以为很公正的批判，也许表达的倒是他的偏见。

曹聚仁与鲁迅确非泛泛之交。虽然他们年龄相差二十岁，文化活动的具体方向也并不相同，但三十年代在上海有一段时间经常交往：在鲁迅日记中，有关曹聚仁的记载达68次。据曹聚仁回忆，鲁迅致他的书信有44封，现存24封，其中20封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被毁。虽然曹鲁的直接接触始于1933年，但追溯起来，曹聚仁初识鲁迅却是在1927年冬天。当年12月21日，鲁迅应邀赴暨南大学发表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记录者就是以“刘率真”为笔名的曹聚仁。这篇重要的记录稿，后经鲁迅校订，由杨霁云编入了《集外集》一书。1932年至1935年，曹聚仁曾主编《涛声》半月刊，协助陈望道编辑《太白》半月刊，与徐懋庸合编《芒种》半月刊，都得到了鲁迅的支持。仅在《涛声》杂志鲁迅就发表过《论“赴难”和“逃难”》、《蜜蜂与“蜜”》、《关于连环画》、《祝〈涛声〉》、《论翻印木刻》、《悼丁君》等诗文。鲁迅说他是常看、爱看《涛声》的，读后常常叫‘快哉’。同时也指出该刊发表的文章中有些是“赤膊打仗，拼死拼活”，跟他的斗争策略很相反；而有的文章又喜欢引古证今，带些学究气，影响了刊物的销路。1933年5月，曹聚仁受上海群众图书出版公司之约，请鲁迅为李乐光（即李大钊之侄李兆瑞）编辑的《守常全集》作序，鲁迅欣然应命，于同月20日撰写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在曹聚仁与鲁迅交往期间也有过短暂的不快。1935年底,鲁迅支持胡风、萧军、萧红、周文、聂绀弩等文学青年编辑《海燕》杂志。经聂绀弩征得曹聚仁同意,在刊物上印上了“发行人曹聚仁”字样。后迫于巡捕房的压力,曹聚仁又在1936年2月22日《申报》上登出了《曹聚仁否认〈海燕〉发行人启事》。事前曹聚仁将自己的苦衷函告鲁迅,以消除鲁迅的误会。鲁迅在2月21日的复信中表示“这不过是一点小事情”。鲁迅既委婉批评了“青年的不顾前后,激烈的热情”,又对曹聚仁“不能不有所顾虑的苦心孤诣”表示理解。^①

正因为曹聚仁是鲁迅的同时代友人,本人也是文化名人,五十年代初即只身移居到可以对中国大陆政治弊病持批评态度的香港,所以他多次对当时神化、圣化鲁迅的文化现象公开表示强烈的反感。曹聚仁对法国作家法朗士的一句话感到强烈共鸣:“人生而为伟大的人物,实为不幸事;他们生前备受痛苦,及其死后,又硬被人作弄,变成与其自身毫不相关的方式”。他自己在撰写史传文学作品时,力求做到对人物分析具体,褒贬得当。比如他笔下的陈望道,既老成持重,又优柔寡断;粘滞使陈望道减低了写作速度,坚韧又使得陈望道在学术研究中精益求精。他笔下的章太炎,对弟子平易谦和,对论敌却唐·吉诃德似的舞矛。即使描写父亲梦歧先生,曹聚仁也没有一意美化,而是既写出了他嫉恶如仇、以身作则的一面,又写出了儒家思想和宗法观念束缚他的另一面。

反对神化鲁迅,是曹著《鲁迅评传》的一大特色,也是全书写

① 关于《海燕》出版一事,曹雷同志认为,“我父亲是受冤的,据先父说当初聂绀弩走过他家找他谈出版《海燕》杂志之事,他表示支持,但并未商定由他当发行人。后来见杂志上刊出“发行人曹聚仁”觉得多少有点强加于人的意思,他登报申明却又被记恨,还一直背着罪名”——编者注。

作过程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评传”一开头就回忆了1933年冬天他跟鲁迅的一段对话。鲁问：“曹先生，你是不是准备材料替我写传记？”曹答：“我知道我并不是一个适当的人，但是，我也有我的写法。我想与其把你写成一个‘神’，不如写成一个‘人’的好。”接着，曹聚仁推崇路特微喜(Emil Ludwig)撰写的耶稣传记。在路特微喜笔下，耶稣是一个常人，但并不失其伟大。曹聚仁表示要以这部传记作为楷范，正视鲁迅思想上的矛盾，而不是把这些矛盾掩盖起来，或加以曲解。

反对神化鲁迅在原则上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将任何历史人物宗教化、偶像化都必将导致对人物的绝对肯定，盲目信赖，致使崇拜者情感失控，背离事实，丧失正常的独立自主精神。鲁迅生前也一贯坚持对历史人物“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评价原则，经常亲手撕毁别人强加于他的一顶顶纸糊的假冠，如“前辈”“导师”“战士”“主将”之类。所以，如果神化鲁迅，也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鲁迅的思想和意愿。曹聚仁撰写《鲁迅评传》的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个人崇拜思潮刚刚开始被清除，而国内的个人崇拜、英雄崇拜的现象却愈演愈烈。曹聚仁在当时再三强调应将鲁迅“人”化，而不应将其“神”化，其意义和影响无疑超越了鲁迅研究的专业范围，而成为了一种警世之音。

不过，在反对神化鲁迅的过程中，我认为至少有两点是必须引起注意的：第一，必须正确区分宗教的崇拜心理和科学的崇拜心理的界限。第二，必须准确区分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成败得失。

崇拜的准确含义是尊敬钦佩。科学的崇拜心理是以客观事实为内在根据的。它反映了人们对于在不同领域将人类历史推向前行的杰出人物的仰慕、赞美、向往之情，反映了崇拜者渴望建功立业和追求高尚完美的一种健康心态。比如半个多世纪以

来广大中外读者对鲁迅的尊崇,就是因为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中国三十年代左翼文坛公认的盟主。他之所以能够作出众所周知的多方面贡献,除开因为他具有超凡的秉赋和付出了超常的劳动之外,还由於他能够准确而深刻地洞察旧中国的沉痾积弊,能够相信人民群众(在鲁迅的作品中被称为“老百姓”“无名氏”“傻子”“愚人”)的伟大创造力,并能够在作品中反映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鲁迅去世之后,上海民众代表敬献了一面写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锦旗,这就是人民大众对他们在文学战线上的忠实代言人的崇高标价。完全可以说,对鲁迅的尊敬、钦佩也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一种具体表现。

提出反对神化的原则是一回事,将这一原则运用於历史人物评价的具体过程是另一回事。前者相对简单,后者相当复杂。传记作者的功力也主要体现在后一方面。

那么,在曹聚仁的眼中,作为“人”的鲁迅到底是什么形象?他有哪些成就和局限性?在曹聚仁笔下,鲁迅是一个认真的人,一个有趣的人,一个廉介方正的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受过现代思想洗礼,头脑最冷静,能独立思考,不随声附和。他观察力强,对世态看得透彻,对人性理解深刻,擅长心理分析,对黑暗势力解剖细密。鲁迅的最大的贡献,在於解剖中国社会。他是一位冷静暴露中国社会黑暗的思想家。鲁迅的风格,一方面可以说是纯东方的,有着“绍兴师爷”的冷隽精密;另一方面又可以说是纯西方的,有着安特列夫、斯微夫脱的辛辣讽刺气息,再加上尼采的深邃。不过,鲁迅也有局限的一面,表现在他的接触范围大体上限於文艺圈,这样就影响了鲁迅的视野和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上述看法,是一个同时代文化人对鲁迅的认识,比较客观公道,能成为一家之言。

读完《鲁迅评传》，还有一些论述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那就是曹聚仁重视吴越地域文化对鲁迅的濡染，强调鲁迅前后期对中国社会问题评价的一贯性。他还指出了王充的唯物史观和吴敬梓“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风格对鲁迅的影响，又指出不能把鲁迅批驳过的若干文化界人士等同於“坏蛋”。这些看法，在五六十年的鲁研界都可以称得上是独到见解，对今天的研究者也仍然不失其启迪作用。

在体例、结构和文风上，曹著《鲁迅评传》同样极具特色。该书第一节至第十七节基本上按鲁迅生平活动的阶段为主线，展示传主的心路历程和创作业绩。十八节至二十九节，从社会观、政治观、文艺观、人生观诸方面介绍传主的思想、性格、社会关系乃至生活细节，做到了脉络清晰，纵横交织，主次分明，重点突出，能多侧面、立体化地使传主的形象跃然纸上。在每节中，作者又将时代背景，传主自述，有关回忆、研究资料和作者的切身观察感受融为一体，做到了理论性、史料性与可读性的统一。文风也亲切自然，活泼生动，的确是以平等的态度跟读者进行文化对谈，丝毫也没有摆出学问家的架子和教师爷的面孔。

曹聚仁深知，他撰写的这部《鲁迅评传》只是“一本通俗的鲁迅传记，而不是一部专家的著述”。因此，如果要求这部书对鲁迅作品进行全面系统的解读，对鲁迅思想的一贯性和阶段性进行深刻剖切的理论阐述，对鲁迅文化遗产的特色及其与中西文化的关系进行纵横比较，等等，那是并不恰当的，因为这种要求超过了这部著作应有的学术负荷。

在阅读曹著《鲁迅评传》时，我认为有一点应该引起读者充分注意，那就是曹聚仁运用了一些传统概念来对鲁迅的思想特征、政治态度、道德取向等方面进行概括，如强调鲁迅是“同路人”，是虚无主义者，是自由主义者，是个人主义者……这些提法

虽然并不是曹聚仁对鲁迅的有意贬损,在特定意义上只不过是
他本人的一种“夫子自道”;但这些提法在笔者看来并不尽妥,采
用这种简单化的提法对鲁迅研究弊多利少。因为概念是人们对
事物本质的认识,它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而客观事物却具有具
体性、丰富性、可变性,所以概念总会随着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发
展而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之中。这种发展的过程或是
原有概念的内容逐步递加和累进,或是新旧概念的更替和变革。
鲁迅是一个有着复杂人生经历的历史人物,他的思想是一种十
分复杂的精神现象。如果不准确厘清曹聚仁所使用的概念的內
涵和外延,读者就无法对他观点的含义进行正确理解,也无法对
他文章的正误进行应有的评断。

曹聚仁认为他对鲁迅的独特理解之一,就是得承认鲁迅自
始至终是“同路人”——不仅指鲁迅后期是中国共产党的“同路
人”,而是说鲁迅的一生,“无论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及后来
的解放运动,都只是革命的“同路人”。

“同路人”是二十年代前苏联文学界流行的一个名词,主要
指那些政治上同情并拥护苏维埃政权但对革命的性质和意义认
识不清的作家。但这个名称在实际运用时却相当混乱。岗位派
和“拉普”派的批评家对“同路人”作家基本采取否定态度,他们
认为“同路人”作家在作品中对革命进行歪曲和中伤,“同路人”
文学在根本上是一种旨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拉普”后
期甚至提出“没有‘同路人’,不是同盟者就是敌人”的极端口号。
另一方面是托洛斯基等人的态度。他们则过高估计“同路人”作
家的作用,否定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认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苏
联文学主要依靠“同路人”作家。俄共(布)中央的态度比较折
衷,一方面承认“同路人”作家群中有许多文学技巧纯熟的“专
家”,另一方面又认为必须注意他们的动摇和分化。1934年苏

联作家协会成立之后,“同路人”作家这个名称便随之消失。

在《竖琴·前记》中,鲁迅曾给“同路人”下了一个定义:“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南腔北调集》)鲁迅又概括了“同路人”文学的特色和变化:反倾向性,没有明确的观念形态的旗帜,奉行“纯粹”的文学主义,持一种没有立场的立场。这类作品对革命和建设持旁观态度,显示出冷淡模样,“革命”在“同路人”作家眼中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艺术的题材罢了。但在“同路人”作家群中,确有不少技术卓拔的出色的作家,如理定,毕力涅克,绥甫林娜等。在1927年前后,“同路人”作家中的不少人因受现实的熏陶,了解了革命,终于与其他倾向的作家合流。依据“同路人”作家的原义以及鲁迅对“同路人”作家的理解和分析,我认为把鲁迅径称为“同路人”、把鲁迅作品等同於“同路人”文学是不符合事实的。

对于曹著《鲁迅评传》的标新立异之处,周作人作了以下评价:“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过,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书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及政治观为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主义’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转引自曹聚仁:《〈鲁迅年谱〉再版跋》)。所以,我们必须接着讨论鲁迅与虚无主义的关系问题。

要判断把‘虚无主义’视为鲁迅思想的根本究竟是否正确,首先必须对‘虚无主义’这个概念进行准确的界定。如果光纠缠於名词本身而不介绍其涵义,就会发生鲁迅杂文中那种近视眼看匾的争论:“在文艺批评上比眼力,也总得先有那块扁额挂起来才行。空空洞洞的争,实在只有两面自己心里明白。”(《三闲集·扁》)

据查考,虚无主义中的“虚无”源於拉丁文“nihil”,为德国唯

心主义哲学家雅科比(1743~1819)首先使用,因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著名小说《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形象而得到广泛传播。在19世纪60和70年代,虚无主义者成为了那些反叛传统和社会秩序、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横和虚伪的民主派知识分子的代名词。后来这个名词的内涵和外延有不同的变化。为避免误会,列宁曾把合理否定旧世界称为“革命的虚无主义”,把盲目崇尚恐怖和破坏活动称为“机会主义的虚无主义”。但作为一种怀疑主义的哲学,它是在“虚无主义”一词运用之前即已产生。比如中国先秦时代的《老子》一书就提出了“绝圣弃智”“绝学无忧”的主张。在当前,虚无主义又演化成了贬义词,专指全盘否定人类文化遗产的思想倾向,或没落阶级悲观厌世的颓废思想。

鲁迅最早接触虚无主义大约是在1907年。当时他在日本读到了克鲁泡特金撰写的《一个革命家的自叙传》,就认识到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跟当时采用恐怖手段的“虚无党”的区别。在以“独应”为笔名发表的《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一文中,周氏兄弟强调“虚无主义,纯为求诚之学,根于唯物论宗,为哲学之一支,去伪振敝,其效至溥”。周氏兄弟特别赞赏虚无主义者“不服权威”,“行贵率真,最嫉文明习惯之虚伪”(原载1907年11月30日《天义报》第11、12期合刊)。

由此可见,周氏兄弟当时肯定的“虚无主义”,与西方流行的虚无主义很少有共同之处,它是一种植根于俄罗斯黑土之上的精神现象,是俄罗斯启蒙运动的一种激进形式。俄罗斯的虚无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不是文化怀疑论者。他们酷爱真理,崇拜科学。他们揭露高尚道德和理念原则掩盖之下的虚伪是为了善。俄罗斯的虚无主义者重反抗。在他们看来,反抗是一种历史现象;没有反抗,俄罗斯人就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命运。简而言之,鲁迅留日时期尊崇的虚无主义者,其实就是十九世纪六七